

## 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笔谈(三)

### “回家”是否是女性发展的合理模式?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赵慧珠

用以支撑“妇女回家论”的直接理由无非是:(1)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难及失业的压力。为了缓冲这种压力,有必要让一部分职业女性重返家庭,以便腾出一部分工作岗位;(2)合理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性条件。而这种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便是男女应有明确的分工,即:男子应侧重家庭以外的工作,以获取经济收入,女子则应侧重家务劳动,以使家庭本身健全起来;(3)在社会转型时期,总要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付出代价。而女性回家,则是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的效益。前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女性解放过程走得过头了一些,因而有必要予以矫正,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重新回家。

应当承认,“妇女回家论”在某些具体的方面有着一定的合理之处。在建国后30年的女性解放过程中确乎存在着某些不当之处。比如,长期以来,在女性参政问题上存在着某种人为拔高的现象。在选拔干部时,有时是依靠行政性的命令,硬性下达女性指标,规定女性名额。这种作法并不能说明女性解放的真实程度,反而强化了其“弱者”形象,加深了女性对于社会的依赖心理。再比如,建国以来,我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消除性别歧视为发端的,但是这一举动却又不小的程度上衍变为抹平性别差异,而忽略了性别差异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妇女回家论”具有着某种矫正性的作用,有助于人们理性地评价我国女性的现状。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妇女回家论”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论点从总体上说是偏颇的,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第一,就业与失业的压力并不能成为女性回家的充足理由。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在传统的一些强体力的工作领域,女子要逊于男子。但在以耐力、智力为主的领域,女子并不逊于男子。现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新的工种、新的职业开始出现,需要强体力方能胜任的生产领域在全部生产领域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小,因而女性参加工作的机会相对来说是呈增多趋势,而不是相反。况且,中国的家庭总收入并不高,其中女性的收入又占将近一半,如果失去这一半,可以想象,一个家庭将很难维持正常生活。中国女性目前在就业方面确乎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消除至少是缓解这些不合理的问题,而不是据此认定唯有“回家”一条出路。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推知,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某个伟人的一时之作。历史在前进中难免有错误,如果说妇女照顾过多,损害了男子的利益,现在男女都在市场的竞争条件下,已很公平,就让男女各显身手去获得社会承认吧。

第二,合理社会秩序的建立并非一定要以妇女回家为前提条件。持“妇女回家”观点者有时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秩序的特点为例,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是一种很合理的社

会分工,既可以提高男子的工作效率,又可以提高女子家务劳动效率,据此进而得出中国女性也有必要效仿的结论。这种简单的类比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几十年的女性解放进程尽管其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不但符合人的本性,同时也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社会与前述国家和地区历史条件的不同,决定了简单照搬别的社会模式的作法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将已有的女性解放成果以男性为轴心而予以回吐,显然难以行得通。一个社会的秩序如何,有其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性别角色是其结果之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少人把一些王朝垮掉的原因归于女子干政,视女子为祸水,已被公认为是荒谬的。而将现今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归于女性就业,同前述论点似乎有相通之处。

第三,让女性付出不恰当的代价以求得社会利益的顺利调整这一说法无法成立。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各阶层的成员确实存在着一个利益重新调整的问题。这意味着许多的社会成员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要付出程度不尽相同的代价。问题在于,哪个阶层成员应付出怎样的代价并不应当以性别为标准,而应以市场选择、公平竞争为尺度。这里,又涉及到如何看待有关女性权益保障的问题。妇女保护法以及其他有关女性方面的特殊规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女性的特殊性的保障,实际上涉及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问题。社会所应做的,是如何进一步使之完善。如果牺牲妇女权益来求得社会利益调整,那么,它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妇女利益和保障,而是社会公平的原则。

## 跳出“公婆论战”的局限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金玲

在今天,“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合作结构和“男强女弱”的性别定位标准已难以再对两性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导向——平心而论,今天“家庭矛盾丛生,角色冲突千奇百怪”的存在,传统角色规范的误导又何尝不该负重要责任?我们现在需要跃出传统的性别规范,跃出两性的对垒,以一种新的思维,平心静气地对两性价值进行新的定位。

要构造一种新思维,或者从新思维出发,建树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目前还有许多前期性的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一项是定量分析。因为只有量的统计和分析基础上把握了确凿的数据和事实,才算真正拥有“批判的武器”,僵持了十余年的公婆论战才会有新的进展。

而对于两性价值重新定位的前期性的定量分析工作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市场对于劳动力的性别需求和社会对劳动力已有的性别配置的定量分析。在这里主要是搞清楚女性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市场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大?女性自己到底应对市场进行多少投资?今天社会在劳动力配置中到底存不存在性别偏差,一种与效益最大化原则相背离的偏差?如果存在,是在所有行业中,还是在某些行业中?是偏向全体女性,还是偏向一些女性——到底有哪些或者说是不是全部“饭碗”男人可以“捧”得更好,现在却落到了女人手中,而且是被胡乱地“捧”着的?通过这一分析,能使两性清晰地了解今天市场对于劳动力的性别需求,更准确地对自己和另一性的市场价值进行定位,更有效地进行市场投资。

第二,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定量分析。过去家务劳动更多地被划归为“弱者”、“低者”的工作,